

跨 海 北 上

黄荣海*

地平线的色调，逐渐深沉起来，由黄绿变为深蓝，并且和秋天的晴空銜溶在一起；远远看去，它似乎还在跳跃着，起伏不定。

“呵，呵，大海！”队伍里轻轻骚动起来。

目的地越来越清晰了，战士们也随着嚷起来：

“这不是冯家堡吗？”

“抗战胜利了，要俺们上哪儿去呀？”

“这里的鬼子、投降派都消灭了，还有仗打吗？”

听着这些议论，我心中也在琢磨着怎样进行政治动员。是的，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民族解放的任务好象完成了，可是战士们哪里知道，刚赶走了一个帝国主义，却又来了一个帝国主义。摆在我们眼前的，仍是一条漫长而光荣的道路。眼前的冯家堡，正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本来，在半个月以前，我们在韩村打了一仗，最终完成了渤海军区首长交给我们肃清沾化、无棣至韩村一线之伪军张之良、李景文等部的任务。第二天晚上，突然接到渤海军区转来的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的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已经开到塘沽、秦皇岛，国民党不仅“接收”了天津、北平、唐山等大城市，而且企图在美军的庇护下抢占东北，以完成其准备内战的战备部署。为了粉碎美、蒋这个阴谋，罗司令员根据中央

本文作者当时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团长。

指示，命令山东大部主力部队，分头由海上、陆地挺进东北。我们渤海的第七师也领受了进军东北的任务。行动之前，渤海军区首长要我带少数精悍部队，从渤海湾插过去，至冀东的乐亭县登陆，探明路径，以便让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横越渤海。由于任务紧急，所以未作任何动员，便向冯家堡开进。

冯家堡座落在突出海面的一个光秃秃的沙洲上，是个不大的渔村，大海从三面拥抱着它。远处几叶白帆，在茫茫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时隐时现。然而同志们都无心欣赏这些，瞅着一字儿摆在海面上的 50 来只木船。有的在嘀咕，有的在发愣。

队伍坐在村外休息，我们把全体共产党员集合起来，传达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同时，要求党员同志在完成这次进军任务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接着，就在沙滩上召开了军人大会。

当我站在队前开始讲话时，三营和团部特务连 900 多人顿时鸦雀无声，个个都瞪着眼睛望着我。我尽力像平时一样平心静气地先从日本投降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谈起，再联系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交给我们的具体任务上来。我说：我们是先遣队，担负着侦察海上情况的任务，地方政府为我们征集的船只有限，所以只能带三营和团的直属队，而且由于任务紧急，不能不火速出发。当我谈到美国兵舰已经开进塘沽、秦皇岛，企图卡住我军北上的道路，并掩护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篡夺胜利果实的时候，战士们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挥着拳头，愤慨激昂地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反对蒋介石篡夺胜利果实！”一定要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光荣任务……”这次政治动员和下达命令的会，只不过一小时就结束了。按正常情况，按这个任务的艰巨性，这样作法未免有些简单草率；但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不待讨论，大家就行动起来。

快到上船的时候，我根据上级的指示，命令全体指战员：为了中途尽可能避免暴露目标，一律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同时，除了每人携带 4 个手榴弹，每班 1 支步枪，每连 2 挺机枪外，其余

的武器统统留给地方武装。最后，我宣布：从现在起到进入东北以前，我们对外的番号是“渤海区海防巡逻大队”。

同志们换上那长短不一、各式各样的便衣，虽然有些别扭，也觉得新鲜；然而要大家留下武器，却议论纷纷，大为不快了。一个高个子战士掂着他的大盖枪在向他的连长申诉：“这是我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以后又用它打死过好几个鬼子。我曾经发过誓：宁可拼掉我这条命，也不能丢掉我这条枪！”连长说什么，他也不听。

我被战士们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挚感情和可贵品质深深感动了。然而，我不能不向大家说明留下一部分武器，给留下的部队和渤海人民，让他们坚持斗争，也是我们人民军队应尽的责任。何况只要我们到了东北，那里有缴获日寇的大量武器很快就能把部队装备起来。这样，那位战士才像临出门的母亲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放进摇篮里一样，用衣袖揩了揩枪栓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船，在船工的吆喝声中慢慢地开动了。战士们站在船舱里、船头上，深情地望着自己为之流血斗争了多年的家乡。血战 8 年，今天刚刚胜利，又要千里转战，连向家人父老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怎能不叫人眷恋呢？我到渤海区抗日根据地虽只短短两年半，可是，残酷的斗争和共同的命运，把我和这里的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今天一旦告别，心里也是久久不能平静。我坐下来看了看手表，便从上衣兜里掏出我那本绿面皮的“行军日记”，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1945 年 10 月 5 日下午 2 时，由山东渤海区冯家堡乘船北上。”

我们日夜依附的大地在水雾中渐渐隐去。团直属队和打仗最棒的七连共约 200 多人，挤在 1 只从顽固派手里缴获来的小火轮上。其他 3 个连，分乘在 50 来只木船上，扬着白帆，沿海边徐徐前进。战士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方面来了。我和团政治处主任贺请同志站在船头上，望着广阔无垠的大海，谈论着未来的战斗生活。我们决心不管冒多大

的风险，这只火轮一定要冲破美、蒋的阻挠，以便把途中的一切摸个水落石出，为后续部队提供情报。

航行不多久，我们的小火轮便把几十条木船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因为上船前已定下集合地点——涧河庄，所以我们就不等他们，小火轮全速向北进发。不一会，大家都开始头晕恶心，加之火轮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煤油味，就一个个连饭粒带酸水地哇哇吐开了，一直折磨到天黑也没停。

夜里值夜的战士前来报告，我们的船位已到大沽、塘沽附近，相隔只有 10 几海里。我担心发生意外，便支撑着摸到船头上去了望。这时，除了轮船上机器的突突声和海水的哗哗声外，似乎在这样一片漆黑的天地里，什么也不存在了。

巡视了一圈，没有发现敌情，我又回到舱里。谁知刚躺下，就听见船后有人喊道：“兵舰 敌人的兵舰追来了！”我不觉一愣 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一些正在沉睡的同志，也霍地爬起来了。我摸到船尾朝远处一看，只见东南角上一片红绿灯光，映出了 3 只兵舰的轮廓，兵舰的桅杆、炮塔，隐隐可见。看样子是奔我们这个方向驶来的。显然，这是美国的。这位不请自来的“盟友”，不仅脸皮厚，而且骄横已极，在我们的领海内，横冲直闯，确实令人气愤之至。但是为了按时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尽力抑住了心头的愤怒，叫舵工把船朝东北方向的深海里开去，同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敌人不打枪，我们不要开火。这样过了约摸一餐饭之久，才发觉兵舰朝西北方向的大沽驶去。

我们的小火轮像只长了翅膀的大鲸鱼，劈开海浪，朝着灿烂的北斗星往前直冲。第二天拂晓，就抵达了冀东军区十八分区的涧河庄。宿营后，我叫报务员向军区首长发电报，汇报我们的情况。从首长的回电中，知道国民党的部分主力已开始由空中、海上，向大沽、塘沽和秦皇岛集结，并指示我们等木船全部到达涧河庄后，再继续出发。

一等就是好几天 直到 9 日早上 才接到当地民兵发现了 1 支

50 来只木船队的报告。我估计一定是自己人到了，才放下心来，急忙派 1 只小船去接他们。直到见了三营长，才知道他们这几天也遭到了许多风险。原来他们出发以后不久，风就完全息了，船队只得靠近祁口一带抛锚。这样等了一天，好容易盼到一丝儿风，才又拔锚起帆。在夜晚通过塘沽一带时，又曾两次遇见美国兵舰从船队前面横弋而过。我了解到这些情况，深为以后主力的安全担心。

因为木船要等风，同时还要补充一些给养，只得又延宕到 15 日拂晓才离开涧河庄。

这天是少有的好天气，太阳升起，东方的海面上撒来一条耀眼的光。仿佛一条银白色的大路，把蓝湛湛的平静的海水分开了，几只海鸥在火轮附近叫着，一起一落地啄食小鱼。同志们经过几天的休息，精神旺盛多了，都在满有兴趣地欣赏着美丽的海上景色。

航行了一阵，忽然，从秦皇岛方向的上空，传来一阵嗡嗡的飞机声。我站在船边，手搭在额头上一望，从北边的云层里，钻出了 10 几个小黑点，不一会，就像走马灯似的围着我们小火轮盘旋侦察。我猜准是美国人的飞机，便命令大家注意隐蔽。正在这时“呜”的一声尖叫，1 架单翼飞机头朝下，对着我们小火轮的行进方向猛冲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得“哗”的一声，海水冲起老高，飞机掉在离我们船头几十米远的海里去了。当溅起的海水落下来以后，只见飞机的翅膀还浮在水面上，机身的后半部露出大半个白五星。不几秒钟，飞机便慢慢沉下去了。活该！呸！这真是玩火者自焚，玩水者灭顶。一个外国军队到别的国家来横行霸道，真是岂有此理！我相信，这架飞机钻进海底这一事实，终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缩影！

部队到达仍属冀东十八分区的乐亭后，当即将这一段所遇到的情况再次电告了军区首长。首长根据所掌握的全盘情况，决定

七师主力不从海上北进而绕道旱路出关。我想，这样虽多耗费一些时日，但较海上要稳妥安全得多。至此，海上探路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23 日清晨，同志们穿上了当地群众给我们赶制出来的棉军衣，继续向山海关进发。一路上，天天遇到从秦皇岛飞来的美国飞机的袭扰，它们就像苍蝇似的，不时在我们头上打转转，气得战士们一个劲儿地骂。

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一根玉带似的城墙随着从海边挺起的山岭，蜿蜒西去。啊！万里长城在望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更快了，不多久就到达了长城的起点，东北的门户山海关跟前。门楼上一个大匾，刻着斗大的黑字——“天下第一关”笔锋刚劲有力，很有气魄。附近的两根铁轨，像纽带一样把关里关外联结在一起了。

守卫在关前的第十九旅的战士们，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制服，打着绑腿，皮带上还挂着一对子弹盒，两手横持着三八枪，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我们的战士在他们跟前走过时，一边看着，一边啧啧称赞。

第十九旅的同志替我们安排好了住处，我们便在这古老的城关里美美地睡了一夜。

10月28日早饭后我们900多人跨出了山海关，经过一个山丘，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脚下正是东北的土地，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的确确实完成了。战士们也都感到这点，部队里掀起一片欢腾的声浪：“到了关东啦！”到了关东啦！”

我们走了两天，终于在一个车站上，遇到了从沈阳开来专为接运我们的火车。

多日徒步行军，大家有些疲倦，一旦坐上火车，指战员们更加舒畅。车厢里歌声嘹亮，战士们唱道：

我们是挺进的先遣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高举起鲜明的红旗，
遍插在失去的土地上。

（原载战士出版社 1979 年版《星火燎原》第 7 集）

山海关保卫战

张维东*

组建第十九旅

日军宣布投降后，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分区部队奉命向敌伪据点发动反攻，促其向我军缴械投降。当部队打下乐亭县城和开平镇后，正在围攻滦县县城时，接到上级命令组建第十九旅开赴东北。上级指定由第十七分区的第十四团、第十四分区的第十五团，以及由第十七分区临时组建的第四十六团，组成第十九旅。由第十七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四团团团长张鹤鸣为旅长。旅部还没有完全组成，即奉命于9月7日由滦县城附近出发，9月8日又接到军区急电，命第十九旅速开山海关，阻击由秦皇岛登陆向东北进犯的国民党军。同时，上级又命令第十四、第十五团划归兄弟部队，将驻山海关的第四十七团划归第十九旅。

至此，第十九旅辖有第四十六、第四十七 2 个团共 2500 人。第四十六团是第十七分区特务连、工人大队和 3 个县大队为基础编为 6 个连组成的。团长龙水文，政委赵静仁，政治处主任张天陶。第四十七团是日本投降后，以临（榆）抚（宁）昌（黎）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团长宋维藩，副政委张兴民。这 2 个团的参谋长是要景祺、贾青年，都是以后调来的。

本文作者当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开始，第十九旅旅部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军政首长只有旅长一人。政治部有个原特派员王雅轩，司令部作战科只有冯远志和我 2 个参谋。侦通科也只有赵衡和张雨亭 2 个参谋，机要科有第十七分区机要股副股长和 2 名译电员，电台和报务员是到山海关后由上级派来的。管理科有第十七分区管理股股长和 2 名管理员。供给处主任是顾华。没有卫生机构。旅部另有 1 个警卫排。第十九旅刚刚组成，就投入了山海关保卫战。

战 前 准 备

到山海关后，旅长张鹤鸣接替第四十七团团团长宋维藩，被任命兼山海关卫戍司令。旅首长立即组织部队划分防线、分配任务、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战训练和形势、政治思想教育。第四十六团负责驻守从老龙头沿石匣河至二郎庙、角山寺一线，第四十七团负责驻守从角山寺以北沿长城至九门口、黄土岭一线，战线长 40 余里。部队在驻守地区贴出安民告示，宣传我军宗旨、纪律和民众应遵守的章法。此时，附近日军早已向苏军投降，秦皇岛港驻有美军一部，尚互不干扰。第十九旅驻防山海关后，还负责接待从各解放区到东北的干部。10 月初，张旅长带我和另一参谋及警卫排一部到沈阳向军区汇报，要求配备干部、武器装备等。但军区只批给我们 8 挺九九式重机枪、8 门八二迫击炮（弹 400 发）和少数三八式步枪。一列火车（五六节车皮）就拉了这么多东西，2 个团就添了这些新武器。10 月 16 日上午，国民党军在秦皇岛开始登陆。在此前后，美国海军飞机，每天在山海关上空低空盘旋，少则二三架，多则 10 余架，进行侦察，支援蒋军上岸集结，并企图对我造成心理上的威胁。当地的国民党军，亦向抚宁县等解放区进攻，袭击我地方政权、武装，捕捉民兵、干部，形势日趋紧张。

国民党军的“最后通牒”

10月下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已逼近山海关西、北郊之线，27日敌第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送来“最后通牒”：“命令你军三天内全部撤出山海关和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由贵军负完全责任”。我旅于29日复牒：“山海关系我八路军收复、解放，城内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勿庸贵军干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坚决消灭之。如贵军蓄意挑起内战，其后果由你军负完全责任”。当晚敌1个搜索连向石匣河等阵地进犯，被我军击退，并被我军俘获排长1人（广东人，押送军区时逃跑）。此后，敌军逐次增强兵力火力，多点向我进攻。由于我旅游击战的观念尚未改变，对大的阵地防御战又缺乏经验，加上武器差、弹药少，敌常以密集炮火袭击，所以我军伤亡、消耗较大。30日那天，为打退敌之集团进攻，打了200发迫击炮弹。旅长说，这样大的消耗不行，我们一要节省，二要向军区求援，但主要是靠智和勇打击敌人。军区曾送来一列火车的弹药，子弹都是三八式和九九式的，而我们旅原有的步枪、轻机枪大多是七九式的，迫击炮弹没有引信也用不上，干着急，但手榴弹却大有用场。部队为了节省弹药，只能等敌人逼近后再射击或以手榴弹、刺刀跟敌人拚杀。还曾集中七九式子弹保障轻机枪使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旅单独抗击了美式装备、号称远征军敌第十三军的猛烈进攻，据守了1个星期，未丢失一个阵地。

俘获三名美军

11月1日上午，第四十六团石匣河阵地前公路上来了1辆挂

美国国旗的吉普车，上面有 3 名美军、1 名翻译，声称要到山海关、长城游览，实际是搞侦察的。接报告后，旅长指示：告知美军，双方正在交战，不能游览，如强行通过，即阻击之。美军不听劝告，反而向我军开枪，我军被迫还击，其司机被打伤，汽车被打坏，3 名美军被我军抓获，人、枪、汽车（用老牛拉的）被送至设在山海关银行内的旅部。旅长亲自告我：这件事关系国际问题，不能给敌人以借口，除了给伤者及时治疗外，一定要监护好其他人，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并要我将其姓名、枪支号码、子弹数目登记、照像，保管好，听候处理。还请来 1 位厨师，为美军作膳食，但他们只吃自己带来的食物。这 3 个美军，1 名是司机，2 名分别是海军和陆战队的上尉军官，翻译是国民党军人。后来经请示军区，我们先将负伤美军司机释放，由法国人送回。这里插一段法国人的事：他们原是抗战前天津法租界驻军，后被日军俘获，集中在北戴河看管。日军投降后，八路军也解放了他们。第四十七团宋团长发给了他们部分枪支。为此，宋团长曾受到批评，后调旅部当参谋长（团长改为邓要揆）。国民党军的通牒和我军的复牒也是由法国人传递的。11 月 2 日军区又复电，可以释放其他 2 名美国人，但须警告美军：“国共两党正在交战，山海关、长城不能游览；美国虽是同盟国，也不例外；不能明知故犯，更不能借机为国民党军搞侦察；因系初犯，故将尔等释放。若再发生类似事件，后果应由美方负责。”警告写成文件，人、枪、弹仍交法国人送回。吉普车未修好，无法送还。现在看，当时如果我们对美军进行侦讯、照像，作为证据，从舆论上谴责，打击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将对我军十分有利。

击退敌人进攻

11 月 4 日拂晓，敌军向我几个主阵地发起进攻。重点是猛攻第四十六团防守的二郎庙、角山寺阵地。先是以炮火轰击，我军

除留少数兵力在阵地监视敌军外，主力进入掩蔽部，待敌炮火稍停，部队迅即进入阵地，以手榴弹、爆破器材、刺刀等杀伤向我冲击之敌。就这样，敌以 1 个团的兵力轮番向我冲击，均被我击退，在阵地前沿抛下了许多尸体。到中午，敌人又集中兵力，加强火力，向我猛扑，我军终因伤亡大，兵力、火力不足，二郎庙阵地失守。这天拂晓军区刚派到第四十六团任职的四五名营、连干部，几乎都牺牲了。原来的营、连、排干部也大部伤亡。如果敌再占领了角山寺，居高临下，山海关会不战自失。在此紧急情况下，加上求援无路，旅长只好将警卫排、机关干部、勤杂人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并集中团的其余兵力，乘敌站脚未稳，发起反冲击。经过激烈拚搏，夺回了二郎庙，并把溃逃之敌追击至 10 余里之外的回马寨。此次激战 敌伤亡不小。我缴获美式轻机枪 3 挺、步枪 10 余支，还有电线、电话等物资。另有一股敌军，窜至山海关北郊，企图夺取临榆县城，与我守军激战，后被赶来增援的山东第七师部队击退。

与此同时，敌人企图打开九门口的通道出关，以 1 个营的兵力多次向我黄土岭阵地突击。该阵地由第四十七团的 1 个排据守，这个排英勇顽强，给敌以有力杀伤，但激战中大部伤亡，其中 1 个班全部牺牲于阵地。危难关头，团的增援部队赶来，击退强敌，才使阵地安然无恙。经过 1 个星期的激战，第十九旅独自阻击住了敌军的进犯。但伤亡 500 余人，消耗很大，部队甚为疲惫。

11 月 4 日拂晓，奉命增援山海关的山东野战第七师抵达山海关，得知城北敌我正在激战，师长杨国夫即派 2 个团向北郊之敌展开反击，将敌击退。当日，第七师与第十九旅调整了部署。第十九旅第四十七团负责三道关防线，第四十六团作为预备队，并派出部分部队防守老龙头、山海关铁路大桥、桥梁工厂和临榆县城。其它阵地由第七师部队防守，并在第七师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大规模的保卫战。6 日、8 日夜两次反击，我军获重大战果。11 日，军委电令第十九旅拨归第七师建制。此后，在第七师首长的

统一指挥下，第十九旅与第七师部队共同坚守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阵地，继续与进攻之敌激战。

向东北转移

18日下午，蒋军以4个师的主力，从城子峪出关，向绥中急进，企图实施外线迂回，切断我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要路。在此紧急关头，师部核实了敌情，遂下决心：撤守山海关，向锦州方向转移。但敌人已形成正面猛攻、翼侧大迂回包围态势，师部命令各部队一面阻击，一面将后勤物资和伤病员东撤。

第十九旅旅长命我乘坐火车，把物资和伤病员护送至绥中县城，交给供给处，并告知顾华主任准备撤离。部队于当日撤至前所。天快黑时，我完成了护送任务仍乘火车回到前所旅部。晚上，侦察科长赵衡到师部联系，在羊圈子被敌潜伏哨俘虏，幸随行的通信员乘马逃回。旅长当机立断，全旅迅速撤离，但部队尚未撤完，敌即追来，以炮火轰击。19日拂晓双方交火，我们边打边撤，战斗很激烈。敌军尾追不舍，直到下午4时许，我们撤到离绥中县城西约30余里的时候，敌军才减缓进攻。这天我旅伤亡50余人，第四十六团一营营长李治国负伤。旅部撤至二台子（绥中县城西20里）时，突然从北面涌来一股五六十名的便衣敌人，旅长立即命令掩护旅部的1个连和警卫排占领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撤至上下牛羊沟一带后，配合第二十旅的2个团占守了2个山头。这里是正面进入绥中的要道，师部原命令我们旅固守这些山头阵地，坚决阻击敌军通过，但晚上又命令我们旅撤退，要求部队尽快撤出阵地向东转移。我们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连，扼守在阵地突出部的小山头上，由于未来得及撤出，当夜被敌重兵包围（两侧已有敌军），救援部队又冲不进去，因此发生了一场恶战。该连弹药打完后，以刺刀捅、枪身打、石块砸，和敌军展开肉搏战。由于突围无望，他们以死相拚，最后把武器

砸坏，手持手榴弹，冲入敌阵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重伤员头枕手榴弹，待敌接近后再拉火消灭敌人。全连 120 余人除 8 名重伤者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7 名重伤员被敌人弄走，其中有该连李指导员，以后听说他们被押在敌锦州重犯监狱。1 名重伤员被埋在尸体中，未被敌搜去，后被老乡发现，抬着给我们送回。旅长听说了该连顽强战斗的经过，非常悲愤，号召全旅学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他们报仇。我们旅在撤退中，共伤亡了 180 余人。

19 日夜按师部命令第十九旅转移至红螺岬山区。此时第十七分区派队列股长周定忠送来 500 余名民兵，补充给四十六团。不久，部队按师部的命令分路向北满进军。据守山海关、阻滞蒋军北进的任务，至此完成。

（原载总后勤部政治部编研室 1989 年《党史资料通讯》第 2 期）

长 春 之 战

曹里怀 邓 飞 徐斌洲*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以与敌大体相等的兵力，经过5天4夜的激战，攻克长春。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开创了我军进行城市攻坚、夺取大城市的成功先例。长春解放后，党中央在给彭真同志和林彪的电报中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

—

夺取长春，是当时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霸占东北，一方面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另一方面又在美军支援下大量运兵到东北，企图以武力抢占地盘。1946年3、4月间，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已有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和第七十一军等6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3月11日，苏军开始由沈阳北撤。13日，国民党军借苏军撤离之机进占沈阳。接着，它便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南北两个方面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妄图利用其暂时的优势夺取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将我军主力压迫到松花江南岸予以消灭。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的攻势，并配合和谈，中

本文作者徐斌洲当时任第七师副政治委员。

央决定我军全力控制北满，并扼守四平，给进犯之敌以坚决的打击。但当时，在民主联军后方与四平前线之间的长春，却由国民党军所收编的伪军“铁石部队”占据着。这是国民党安置在我军后方的一个钉子。它不仅威胁着我后方的安全，还给支援前线等军事行动造成许多不便。因此，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不能不考虑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攻打长春，是经过反复酝酿，由东北局首先提出的，党中央完全赞同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46年3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开会，讨论了东北形势，和谈与打仗，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等问题。12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示：苏联红军撤出后，军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必须打几个胜仗，以利和谈。目前应立即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16日彭真同志致电中央，请中央考虑可否在苏军撤离之际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这些城市。17日中央复电彭真同志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4日中央又电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25日中央指示彭真同志和林彪：“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为此，东北局于3月26日就作战部署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29日，东北局发出“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各市”的指示，并报告了中央。30日中央复电东北局：“给各地指示电悉，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除武装。”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为夺取长春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攻打长春，是一场大城市的攻坚战，当时我军尚无这方面的经验。我军参战部队无论在兵力上还是火力上，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完成任务并非没有困难。但当时，由沈阳北犯之敌被阻于四平以南，长春之敌孤军苦战，守志不坚。因而，东北民主联军

总部队为：只要我军部署得当，指挥正确，协同动作，虽用与敌相等的兵力也能够歼灭敌人。由于判断准确，且紧紧抓住了苏军撤离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烈攻击，终于一举而下，攻克了这座当时已有 80 万人口的城市。

二

长春地处东北中心，是东北境内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的所在地。日本投降后，苏联远东军指挥部和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也都设在这里。长春有着坚固的防御设施，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多为永久性工事，易守难攻。守敌除从华北调去的号称“铁石部队”的伪军姜鹏飞部外，另有 15 队、1 个骑兵大队、5 个警察中队和一些日本兵，总兵力约 2 万人，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攻夺长春之战，是由吉辽军区负责指挥的。战前，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梅河口召见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彭真同志说：“东北局已开过会，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局势，研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决定不惜代价夺取长春。”彭真同志还对敌我双方态势做了说明，并指出我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为了拟就作战计划，吉辽省委和军区，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和司令员周保中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4 月 11 日，《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最后确定。我军参战部队组成为 3 个纵队，大体部署是：

西南纵队：由北满第七师第二十旅的 3 个团，第二十一旅的 2 个团和新四军三师八旅的 4 个营组成，共约 9000 人。杨国夫为司令员，刘其人为政委，徐斌洲为副政委。作战地区是大同广场南段的斯大林大街以西和兴安大路以南，主要攻击目标是：西郊飞机场、兴安桥陆军医院，伪满洲国国务院、交通部、司法部，南